

绪 论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包括占半数的妇女,进行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生,发展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妇女的苦难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广大妇女,倍受剥削压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来压迫人民,禁锢妇女。广大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支配。她们在专制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没有参政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族长、家长执掌着一套封建的规矩,可以惩罚和处死妇女;反动统治阶级用所谓鬼神权力的“精神鸦片”,来愚弄和毒害妇女;妇女受男权支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没有独立的人格,连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也没有;包办买卖婚姻制度和童养媳、等郎媳等种种封建恶习,给妇女的痛苦尤深,族长、家长还强迫青年妇女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牺牲一生的幸福。

在旧社会,女工、农妇过着非人的生活。

中国的女工不仅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尤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女工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工时极长,一般每天要干 14 至 17 小时;工资极低,男女同工不同酬,如上海缫丝、棉纺等 17 种产业,一九三一年男工月平均工资 24 元 4 角 8 分,女工月平均工资只有 10 元 3 角 6 分;劳动条件极恶劣,几乎

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产前产后没有休息,往往一怀孕即被解雇,伤残病老就踢出厂门;调戏,强奸,克扣工资,罚工,非刑拷打,开除,厂方将种种虐待加在女工身上。一九二四年二月上海丝厂失火,烧死女工 300 多人,起火之后,厂主怕丢失货物,竟不肯开锁抢救人;包身工的处境更为悲惨,她们都是包工头从农村招来的女童和女青年,在三年或五年,甚至七年八年契约订定的包工期间,工资全部交包工头,上下班由包工头押送,不许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她们吃的是霉米、烂菜,住的是臭虫成堆、蚊蝇成群的“鸽子笼”,有病得不到医治,常常被折磨而死。

农村妇女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高额地租,“驴打滚”的高利贷,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许多农家妇女,被抢或被逼给地主顶租,抵债。大小军阀争相抓丁扩兵,许多妇女失去丈夫,儿子,生活处于绝境。由于帝国主义倾销工业品和中间商人控制产品的销售,使农村妇女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濒于破产。天灾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如一九三六年有 15 个省发大水,庄稼被席卷一空,至少有 28 万人丧生,8000 万人无家可归,冻饿或病死不计其数,易子而食的惨剧到处发生,许多妇女沦为娼妓。

旧中国大多数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盲占 90% 以上。即使有少数女子受到一定教育,也很难找到职业。

在旧社会,中国妇女还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酷迫害。

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华民族蒙受空前浩劫,对妇女大规模地奸淫、杀戮,惨绝人寰。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晋冀鲁豫四省的 2290 万妇女中,有 10 万被杀害,36.3 万被强奸。南京沦陷时,日寇不仅对当地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还四处搜罗妇女,集体奸淫。上海等地的日本浪人,设庞大的机构,把掠来的妇女儿童运往天津、大连等地转运

国外贩卖。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走上解放的道路

苦难的中国妇女迫切要求解放,妇女运动的先驱们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同时,就开始探索妇女解放之路。五四运动揭开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序幕,也开辟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五四运动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树立了俄国妇女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解放的榜样,培养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妇女人才,其中杰出的代表如向警予、郭隆真、缪伯英、蔡畅,邓颖超等,这就为中共领导妇女运动准备了理论基础和干部条件。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争取妇女解放的事业有了根本保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的观点,其要点是: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支力量;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条件;妇女运动必须与武装斗争密切结合;建立和发展妇女界的统一战线;把妇女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建立妇女组织和培养妇女干部。这些观点,成为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根据当时的形势,党的中心任务,妇女的迫切要求,制定了妇女运动的决议和指示,

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早作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①指明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是在无产

^①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 第 29 页 1986 年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当前任务是帮助妇女获得普选权与一切政治上的自由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并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内设妇女部，中共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当时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向警予等女干部都深入工厂做女工工作，女工的斗争呈现出鼓舞人心的局面，一九二二年仅上海、湖北、广东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就有 60 多个，参加的人数有 3 万人，先后罢工 18 次。

在一九二三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总方针，作出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①明确指出了“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任务，为此，许多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及地方党部的妇女部合作，进行妇女工作，并将一些女权运动组织吸引到国民革命的队伍中来，还建立了妇女协会，妇女联合会、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各种妇女团体，实现了以女工农妇为基础的各界妇女大联合，在响应省港罢工，促成国民会议，参加五卅运动，支援北伐战争中，掀起了妇女运动高潮。站在反帝反封建前列的女学生刘和珍、杨法群，魏士毅等，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饮弹牺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拿起屠刀，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女共产党员，进步妇女惨遭毒手，国民党左派女党员张挹兰，和李大钊等 20 人，在封建军阀的绞刑架下从容就义。

为了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于 1927 年 8 月作出《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②指出：要训练女干部，使她们懂得秘密工作的知识，派人到女工农妇中作秘密宣传；秘密恢复被封

①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 68 页，1936 处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 294～295 页

闭的进步妇女组织；到反动妇女团体中去做工作，与左派国民党员共同组织妇女小团体。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后，妇女运动逐渐恢复和发展。在艰苦的斗争中，许多优秀的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逮捕，她们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有的英勇牺牲了。其中有著名的女烈士向警予、郭隆贞、陈铁军、黄励、杨开慧、肖国华等。

当时，中国共产党把革命主力从城市转入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①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58号中央通告中，都指出要特别加强农村妇女工作，发动农妇参加一切斗争，并注意解决她们的切身利益。在8个省、300多个县的范围内所建立的15个根据地中，各级红色政权贯彻临时中央政府宣布的一系列解放妇女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令；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部、妇女工作委员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妇女在各项工作中贡献了伟大的力量，表现了英雄的姿态。由于党内“左”的错误，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妇女运动再次受挫。一些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妇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随着红军主力进行长征的有几千名妇女，她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人倒在血泊中，部分人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抗战。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②指出要在妇女工作中坚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9～317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文编《六大以来》下册764～769页

高妇女的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①要求“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地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以后中共还多次发布过对妇女工作的决议,指示。如一九四三年二月,为纠正王明任中央妇委书记期间在妇女工作上所犯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②,确定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和推动国统区的妇女运动。亿万妇女投入抗日救国洪流,妇女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中,人民政府颁布和贯彻执行了一系列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特殊权益的政策法令,边区(省)、专、县各级中共党委设立妇运领导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干部,并普遍建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或妇女联合会,团结着7000万妇女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救国和反封建斗争。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妇女运动也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妇委号召妇女动员起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妇委及南方局妇委,号召各界妇女组成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斗争。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上制定了在土改中贯彻男女一齐发动,保障妇女切身利益的方针,并要求全党作妇女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文《六大以来》下册 764—769 页

②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7~9页 1979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工作的决定^③，指出要继续执行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一亿多人口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妇女运动更加广泛、深入。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的巨大贡献

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觉悟日渐提高，她们冲破来自家庭、社会的封建束缚，战胜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英勇无畏地和男子并肩战斗，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革命根据地妇女在支前、参战、土改、生产中奋勇当先

1、踊跃支前参战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东征北伐中，妇女团体就发起募捐、慰劳、救护等活动，踊跃支前，随军参战，还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批女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她们曾参加平息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她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又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参战支前的妇女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譬如抗日战争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妇女的自觉行动，在一次参军运动中，山东10个县和冀中7个县就有5200多名妇女亲自把儿子、丈夫送上前线。山东博兴县参军的3000人中，由妇女动员的占80%。妇女们还为前方战士缝制衣被、鞋袜，运送粮食和副食品。据一九四〇年统计，在晋察冀冀中区，为前线服务的妇女有384万人，占该区妇女的80%。据陕甘宁、晋察冀、山东等地区一九四一年不完全统计，妇救会发动妇女做军衣74.48万套，做军鞋军袜79.74万余双，送了大批鸡蛋，几千只猪羊作为慰问品，还捐献

^③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13~20页，1979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银首饰 110 余两，银元 4358 块。山东海阳县 3 个分区的妇救会员，组织 306 个担架队，共有 1836 人参加，在 20 公里的道路上运送伤员。她们还组织了 259 个运输队，在 150 公里的道路上运送军粮。荣获“子弟兵母亲”称号的戎冠秀，是河北平山县下盘松村妇救会会长，她送两个儿子当了八路军，她组织妇女做的军鞋特别结实，交的军粮筛得最干净，并带领妇女抬担架、运伤员，被评为支前模范。著名的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鼓励和支持儿子英勇杀敌，她被日寇逮捕后，怒斥敌人胁迫她写规劝儿子“归顺皇军”的卑劣伎俩，坚贞不屈地绝食殉国。

妇女直接参战的，有由青壮年组成的女民兵或女自卫队，她们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武工队，埋地雷、挖地道、封锁要隘、构筑工事、运送弹药、看押俘虏，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中的女指战员。例如印尼华侨李林，曾在山西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队当过政治委员，在击退日寇 7 次“扫荡”中屡建功勋。一九四〇年当敌人又一次发动“扫荡”时，李林负责掩护晋绥边区十一行署机关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她负伤后因寡不敌众，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喉部，英勇牺牲。东江纵队娘子军连连长李玉珍，琼崖纵队的女战士刘秋菊，都是使日军闻风丧胆的女英雄，被描绘为“飞檐走壁的飞将”。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中的大批女医务工作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设于洞穴、树林、破庙、河岸的后方医院，日以继夜，救死扶伤，涌现了许多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

还有一些抗日女战士，因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被杀害。如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女文书赵绿吟；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军部女机要员施奇，以及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又迁移到福建崇安时，由于部分指战员举行了赤

石暴动，女战士瞿淑、戴庆哲、李捷、汪企求、杨瑞年、胡珍水、徐瑞芳等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2、革命根据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斗争，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妇女的作用尤为显著。在动员工作较好的地区，参加土改的妇女约占妇女总数的50~60%，有些地区达80%；贫农团、新农会中妇女占40%左右。参加各级农民代表会的女代表，其百分比在村级约占30%左右，区级约占20%，县级约占10%。她们受压迫最重，痛苦最深，所以参加诉苦最踊跃，起的教育作用最大。如晋察冀边区北岳地区土改时，妇女参加诉苦的占整个农村劳动妇女人数80%以上。她们的诉苦，激起了群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也增强了妇女本身反封建斗争的意志。很多农妇，锻炼成了干部。仅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在土改中就涌现出805名农妇参加了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工作，壮大了干部队伍。

3、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

在战争年代，大批青壮年男子奔赴前线，根据地妇女肩上的生产任务很重，作用很显著。土地革命时期，她们普遍学犁耙，成为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中的主力。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就有10多万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开荒6万多亩，植树7万多株，还发展了养鸡、养蜂、养蚕、养猪，纺织等多项副业。一九四一年陕甘宁、晋冀鲁豫、晋西北三个地区的妇女开荒59.33万余亩，植树57.3万余株，养猪15.3万余头，养鸡6万多只，一九四三年以后，开展了纺织运动。陕甘宁边区到一九四四年有17万左右的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共纺棉线毛线160多万斤，织布11万多匹，解决了全边区军民用布量的三分之一，妇女出售纺织产品所得，占家庭总收入51.2%。山东解放区组织了80万妇女的纺织大军，全区妇女一年纺织收入，足够维持500万人的全年生活。解放

战争时期,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和规模又扩大了。在老解放区,妇女参加生产最好的地区,达到女劳动力 100%。有些地区,全家生活完全靠妇女生产来维持的占总户数的七分之一。新解放的东北地区的妇女,原来无生产习惯,土改以后开始广泛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纺织生产也发展很快。一九四七年太行开展了有名的百日纺织运动,参加劳动的妇女 70 余万人,占全部女劳动力的 74%,比一九四三年增加了 10 倍,3 个多月即织布 1741 万平方米,保证了全区 400 万军民需用的布匹,战胜了被敌人封锁的严重困难。在生产中,许多妇女被评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以后评选出 600 多名妇女劳动模范,其中最著名的有农业劳动英雄马吉儿、郭凤英,纺织劳动英雄黑玉祥、刘桂英等。晋绥边区有妇女生产旗帜张秋林,冀南解放区有互助组模范郭爱妮,还有八路军军属生产模范陈敏等。她们善于团结群众,并创造了组织群众生产的好方法。

(二)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妇女的艰苦斗争

1、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工人掀起反日大罢工。上海 23 家日本纱厂的男女工人建立了抗日救国会,举行同盟罢工;郑州日本纱厂男女工人罢工,迫使日本厂主纷纷离华返日。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集会游行,建立抗日团体,女学生还组织了反日救护队、慰问东北难民同盟队。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济南、厦门、青岛等市的女学生,参加了向南京国民党政府 3 次请愿的斗争,要求对日宣战。一九三五年,女学生奋勇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她们不怕军警的鞭子、水龙,不怕饥饿严寒,连续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后来又走出城市,到农村去宣传和调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史良任总务部长;接着南京,北平、天津、山西、广

西、山东、河南、广州、武汉等省市也成立了妇女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生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入狱事件，史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爱国入狱，各方面人士群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 16 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如果爱国有罪，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并由宋庆龄率领，亲往关押“七君子”的苏州高等法院要求羁押。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2、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

何香凝在法国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回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她在上海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并将新加坡爱国华侨委托她带回的捐款送往东北，支援东北义勇军。翌年在十九路军爱国将领指挥下，爆发了林沪抗战。宋庆龄、何香凝发动妇女办了几十所伤兵医院，组织了妇女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并亲赴抗敌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妇女们 5 天赶制了全新棉军装 3 万多套，献出金银首饰和衣物。全国各地妇女也参加义勇军赴沪参战，著名的有广东女救护队约 200 人，南京女子救沪队 30 人，四川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里也有 3 名女学生。一九三六年二十九军在绥远与日寇展开激战，蒙古族和汉族妇女以高昂的抗日热情，组织起来，承担起护理伤员的工作。上海、南京、太原、北平、天津的妇女界都展开了援绥活动。何香凝再次举办画展，集资赶制丝棉背心和毛巾等慰劳品；南京妇女爱国同盟会将募捐来的 1.6 万元和 1500 件皮大衣及其它慰问品送往绥远前线；太原女师学生在山西牺牲同盟救国会女会员带领下，组成救护队，到前线看护伤兵。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下，妇女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至一九三

八年五月已有 105 个,为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如何香凝发起组织的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主要成员是纺织女工,该团自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 3 年之中,随国民党第十八军罗卓英部行动,辗转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 8 个省,行程 2 万里,她们在抗日士兵中宣传、演出,进行文化教育和纠正军风纪,遇有战事,即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还在部队驻地发动群众,组织妇女一起为士兵服务。谢冰莹组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于一九三七年九月赴江浙前线,在嘉定,苏州一带的野战医院救护伤兵,捉汉奸,审俘虏,并做抗日宣传和民众的组织工作。四川、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都在前线贡献了力量。广西一九三七年冬成立了女学生军,共 130 多人,她们步行从桂林出发,20 天后到达武汉,不久随五战区抗日军队转战鄂东、豫南、安徽一带,不少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三八年五月浙江绍兴组织了妇女营,她们和青年营配合,与日寇交鋒,十分英勇,曾受到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慰劳总会,以及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基波教女青年会等团体,在后方进行了慰问抗属、伤员、收托难童、发动捐献等各种活动。从战地抢救出难童 2 万多名,收养在 48 所教养院中;一九三九年三八节前后,各地妇女捐款 500 万元以上,仅重庆一地在三月五日“妇女献金日”一天,即募集 63 万元;一九四三年的“妇女号”献机运动中,妇女共捐献 260 余万元。

一九三八年六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广泛联系各国进步人士和援华团体,大力动员组织海外华侨,募集大量物资、现款,给全国各地的难民、灾胞、伤员、孤儿以有力的帮助。她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冲破重重封锁,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

队运去大批药品,重要的医疗器械,输送许多医术精良的大夫,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米勒等。对援助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3、日寇占领区妇女的英勇反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寇占领后,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从未停止过。汉族和朝鲜族妇女秘密组织妇女会、姊妹会等,积极开展抗日工作,为游击队侦察敌情、递送情报、输送军需物资,赶制军鞋、向群众宣传抗日。一批中共女党员深入群众,发动组织群众武装,参加武装斗争。如赵一曼,开始在东北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四年调任中共株河中心县委特派员,她秘密组织农民自卫连,配合人民革命军作战,后来她到东北抗日联军任团政治委员,在与日寇作战时被俘,从容就义。抗日联军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指战员和女后勤人员,涌现了不少赵一曼式的女英雄。如抗联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和朝鲜族女战士,一九三八年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同敌军遭遇,在女指导员冷云率领下,浴血奋战,弹尽药竭,每个人都遍体鳞伤,就互相搀扶着,冲向了激流滚滚的乌斯浑河里,壮烈殉国。

在沦于日寇之手的大城市中,妇女们也参加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例于孤岛时期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上海女界难民救济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妇女团体,发动组织妇女进行斗争。如一九三九年为募集10万套棉衣送给新四军和救济上海租界上的难民,由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举行物品慈善义卖会来筹集款项。她们战胜日伪暴徒捣乱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这次义卖的成功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使日伪当局又恨又怕,派遣特务枪杀了义卖主持人茅丽瑛,上海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仪式,悼念烈士,对日寇来了一次大示威。

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由女党员周彬和王若锡领导，用极为隐蔽的方式，传播马列主义，发展中共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积聚革命力量，并输送了近百名青年到解放区，著名教育家费起鹤的女儿费路路，利用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父亲的社会影响，搜集敌人情报，印发秘密文件，掩护中共党的干部，为解放区捐赠，购买、输送医疗器械及其他急需品。

广州市地下党中的女党员，有的驻守中共秘密机关，掩护领导干部；有的打进敌伪机关，搜集情报；有的深入工农群众和大中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中共外围组织“游击之友”，有的来往于广州和革命根据地之间，担任秘密交通工作。一九四五年夏季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女共产党员们勇敢机智地参加了散发《告广州同胞书》的大规模行动，当一夜之间，广州大街小巷撒满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名义印制的传单时，全市人民异常振奋，日寇惊恐万状。

天津、武汉、南京、杭州及其它许多敌占城市和地区，都有爱国女志士，出生入死，为国尽忠。

4、在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英勇奋斗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妇女奋勇参加了一浪高一浪的反美反蒋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昆明西南联大等高校 3 万学生罢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在美国的美国侵略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云南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疯狂镇压，发生了“一二·一”杀害 4 名爱国学生的惨案，其中女学生潘琰是中共秘密党员。一九四六年六月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向华北、苏北解放区进攻时，上海 60 多个人民团体派代表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南京请愿，上海的女工、女学生和民主妇女参加了 10 万人以上的欢送代表的大会，会后又参加了反内战大游

行。代表们到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多人,其中女教授雷洁琼受重伤,女记者浦熙修也受了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帝国主义订立了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美军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肆无忌惮,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半年中美军肇祸事件达 800 起之多,其中不少是强奸妇女和军车碾死妇女儿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的罪行揭露后,全国 50 多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各地的爱国妇女纷纷参加学生的抗暴活动,上海各妇女团体组成中国妇女界抗暴联合会,统一行动,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港、台妇女和海外华侨妇女也积极声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军事失利,更加穷兵黩武,加紧征兵,征粮、征税,美国独占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结合,控制了整个国统区的经济生活,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许多城市出现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更加高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京、沪、苏杭地区 16 所专科以上学校的 6 千多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被警、宪、特务打伤 500 多人,同一天,天津南开、北洋高校学生的游行也遭特务殴打,许多学生受伤或被捕。其中一些女学生受重伤,一些女学生被捕后遭毒打,即著名的“五·二〇”血案。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 29 个城市,有 320 万工人大罢工,响应学生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申新九厂 6000 多女工在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用催泪弹、装甲车、马队包围攻击下,和 1000 多男工一起,英勇地同敌人斗争,她们被开除、被击伤、被逮捕,但是始终没有屈服。在遍及 17 个省、人数达 100 万的反征兵、反征税的农民武装起义队伍中,也有大量妇女。

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当国民党政府准备逃离时,妇女参加了反搬迁、反破坏。她们护厂、护校、保护铁路桥梁、银行仓库、物资档案、电台等等,以配合解放军进城,迎接解放。

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和作垂死挣扎时,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许多女中精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一批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先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分批屠杀了300多革命志士,其中有谢葆贞、江竹筠、李青林、徐林侠、杨汉秀、胡启芬等女烈士20名;还有一九四七年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英勇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的刘胡兰。她们和无数先烈一起,用鲜血浇了解放之花,她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三)各界妇女大联合的实现

在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处在分散状态,妇女群众组织也无统一领导机构。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的各根据地妇女界代表座谈会上,通过了成立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提议,由陕甘宁边区妇联作发起人。六月二十日,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各解放区筹备委员共40余人。筹备会选出常委13人。并选出筹委会主任蔡畅,副主任邓颖超、白茜,秘书长区梦觉。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战争获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为了进一步搞好解放区的妇女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副主任邓颖超主持,于河北平山县召开了一次有各解放区妇女工作领导干部参加的妇女工作会议。这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各解放区妇女运动的经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莅会作了报告。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

根据九月妇女工作会议的建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为适应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集中妇女的战斗力量,解放区妇女团体,应当努力去联合全国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妇女,共同为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决议规定:“由解放区妇女团体发起,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使全国妇女运动能在统一的方针领导下,更大的和更有力量的向前发展”^①

根据上述决议,由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副主任邓颖超等,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日寇占领区工作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进行民主协商,确定成立全国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委员除原来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常委 13 人外,增加了来自国统区的知名妇女 14 人为委员,其中筹委会常委 7 人。并推选蔡畅为筹委会主任,邓颖超、李德全为副主任,张琴秋为秘书长。

经过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的努力,很快就做好了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三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完成了各路妇运大军胜利会师的历史任务,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 20 页 1979 年 31 日人民出版社出版